

# 文化意识宇宙的探索

唐君毅新儒学论著辑要

现代新儒学辑要丛书

---

——唐君毅新儒学论著辑要

---

# 文化意识

---

## 宇宙的探索

---

唐君毅 著  
张祥浩 编

---

---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

# 文化意识宇宙的探索

——唐君毅新儒学论著辑要

唐 君 毅 著

张 祥 浩 编

责任编辑：罗林平

封面设计：李 萌

版式设计：张智勇

•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复外真武庙二条九号 邮政编码 100866)

北京经纬印刷厂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850×1168 毫米

大 32 开 19.25 印张 382(千)字

1992 年 5 月第 1 版

1992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5000 册

ISBN 7-5043-1038-7/G·351

定价：11.50 元

(京)新登字 097 号



《现代新儒学辑要》丛书编委会

主 编 方克立

副主编 张品兴

编委会成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     |     |     |     |
|-----|-----|-----|-----|
| 方克立 | 宋连昌 | 宋志明 | 余新华 |
| 张品兴 | 罗林平 | 郑大华 | 郑家栋 |
| 高聚成 | 徐少锦 | 焦树安 |     |

# 总 序

五年前，“现代新儒学”或“现代新儒家”对于人们来说还是完全陌生的名词；在今天，它们不仅已经堂而皇之地出现在我们的报刊上、书册中，而且迅速地发展成为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中的一个新领域、新热点。

现代新儒学本来是七十年前就已经在中国大陆产生、经过了三十年奠基和发展的一个学术思想派别，它的前期代表人物梁漱溟、熊十力、冯友兰等都在中国现代思想史上占有显赫的地位。解放后，作为一个思潮和学派来说，因其反对马克思主义和唯物主义的基本理论立场而不可能在中国大陆继续存在和发展，它的阵地遂转移到了港台和海外。而就整个中国现代思想史来说，现代新儒学并没有断绝薪火，在第二

个三十年它又经历了新的重要的发展阶段,进入八十年代以后更有进一步走向世界、发展成为一种国际性思潮的趋势。由于海峡两岸隔绝三十多年,国内的读者对这些情况均难以知悉,并在一再“批儒”的气氛中对这种思想感到十分隔膜。

随着中国大陆的改革开放,域外的各种思潮蜂涌而入,这种本来就是在中国土地上产生,并以维护中国民族文化精神为旗帜,以解决传统和现代化、中西文化关系问题为宗旨的思想学说,自然不会放过回归本土的机会。主要是通过一些海外华裔学者的努力,积极推动“儒学第三期发展”的“儒学复兴”说在八十年代中国的文化讨论中俨然成为了一派显学。文化讨论的现实感受加并不遥远的历史的回顾使人们很快地接受了“现代新儒学”和“现代新儒家”的概念。

关于现代新儒学,现在人们谈论得很多,但是由于研究刚刚起步,资料掌握还很不齐全,特别是对于港台和海外的新儒家学者,研究资料尤其匮乏,因此人们的认识难免是笼统浮泛的、很不一致的,包括现代新儒家的对象、范围、代表人物、发展阶段、思想特征、历史评价等问题,在认识上都颇多歧义。至于更深层次的问题,诸如现代新儒学对传统儒学的继承和开新,对近现代西学的融摄和“儒化”,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敌视和某种意义上的启示;这个文化保守主义的思想派别是怎样和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的西化派“在许多共同观念的同一架构里运作”的,它对中国文化现代化的贡献是什么而限制又是什么,它将会有怎样的发展前景,等等,都有待于在掌握大量资料的基础上逐步深入的研究和讨论,才有可能作

出切实的回答。

对于一切研究者和关心中国现代文化发展的人来说，占有最基本的研究资料，原原本本地弄清现代新儒家学者都写了和说了些什么乃是首要的前提。为此我们编辑了这套“现代新儒学辑要”丛书，旨在为广大读者提供一套精选的系统的研究现代新儒学的第一手资料。它不同于国内已经出版的众多新儒学评论集、港台海外新儒家论文选集和新儒家个别著作的重印本，而是力图从反映整个思潮发展的角度，将现代新儒学各个阶段代表人物的主要代表作挑选出来，分别汇编成册，以便读者准确地把握其新儒学思想的实质及其个性特征。为了帮助青年读者正确认识复杂的思想文化现象，各册编者分别撰写了“编序”，除了介绍一些基本情况外，还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对有关思想资料作了初步的分析和评论。

读者可以看到，我们是采取了广义理解的“现代新儒学”和“现代新儒家”概念，即超越了新儒家学者之间的师承、门户之见，把在现代条件下重新肯定儒家的价值系统，力图恢复儒家传统的本体和主导地位，并以此为基础来吸纳、融合、会通西学，以谋求中国文化和中国社会的现实出路的那些学者都看作是现代的新儒家。这套“辑要”所选的十五位作者，涉及“五四”以来的三代人，他们之间的个性差异是相当明显的，但是都不乏上述“共性”。他们中的马一浮、方东美、余英时、成中英等人，能否归属于现代新儒家的范畴，学术界一直有不同看法。这里提供了一批反映其新儒学思想倾向的资料，特别是集中反映其现代新儒学的文化观和哲学思想，希望有助于对他

们的思想特质和精神方向作出符合实际的定性判断。当然这决不是说,他们的思想不可能包含矛盾,不可能表现出多样的形态,但这些资料至少对了解他们思想的一个重要侧面是有帮助的。

我们研究现代新儒学的目的,不仅是为了对“五四”以来中国思想文化论争的历史和现状有一个清晰的了解,作一种简单的是非评判,更重要的是为了通过总结历史经验,探索一条更有效的、更切实可行的中国文化和中国社会现代化的道路。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和社会主义的方向不可动摇,怎样更好地结合中国的国情,更好地利用我们传统的资源,怎样更好地吸收别的国家现代化成功的经验和域外一切先进的思想文化,使中国的社会主义新文化成为包容性最大的、最富有民族特色和最能体现时代精神的文化,则是一个需要认真探索解决的问题。为此,我们必须以宽阔的胸襟和宽容的态度来对待一切致力于民族振兴、探索中国现代化道路,并且也确实某一方面做出了独特贡献的思想派别,包括那些曾经批评和反对过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派别。他们的思想主张中哪怕只包含着片面的真理,也应该加以厘清,加以肯定,批判地借鉴和吸收。现代新儒学在维护和弘扬中国民族文化传统、批判民族虚无主义、融合中西哲学和文化、探索传统文化现代化的道路等方面确实做出了重要的贡献,这份思想财富我们就应该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加以总结和批判地继承。所以,这套“辑要”决不只是为读者提供一套供批判用的“反面教材”,而应该看作是中国人的现代智慧的一部分,是一套中国现代思想文

化的名著。所选十五位作者在中国现代思想史上都堪称名家，把他们的代表作称为“名著”并非言过其实。当然，“名著”中所写的不见得都是真理，我们也不赞成“复兴儒学”的观点，但是完全可以把它作为一种有影响的思想学说来研究，包括它的错误亦能给人某种启迪。如果大家能同意这个看法，那么出版这一套书的价值和意义也就是不容置疑的了。

方克立

1990年11月8日

# 编 序

## 张祥浩

唐君毅，四川省宜宾县人。1909年1月17日生于宜宾柏溪镇，1978年2月2日因患肺癌卒于香港浸会医院。他是我国现代著名的学者、哲学家、哲学史家、现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在港台和海外有着广泛的影响，被牟宗三誉为“文化意识宇宙的巨人”。

### 一

唐君毅的先世是广东五华人，7世祖以岁荒迁徙四川宜宾。父亲唐迪风，是清代最后一科秀才，好儒佛，师事当时著名的佛学家欧阳竟无。后在成都、重庆等地教中学和大学，有《孟子大义》留存。母亲陈大任，有诗才，重家教，著有《思复堂遗诗》。唐先

生自幼受到父母良好的教育。

唐君毅读书很早，两岁便开始识字，6岁读《老子》，8岁背《说文》。10岁就读于成都省立第一师范附小，12岁随父到重庆，入联立中学读书。

中学时期是唐君毅人生观、学术思想开始形成的重要阶段。他入联中时，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浪潮涌入四川，共产党员肖楚女、恽代英、张闻天都曾到联中讲演，批判传统文化。国民党国家主义派人士，也在重庆频频活动。唐君毅虽然喜欢看当时的新杂志与新书，但由于性情孤僻，并不跟随潮流走，对新思潮“发生一些莫名其妙的怀疑和反感”，<sup>①</sup>常和当时的几个朋友互相勉励，以必成贤成圣为志。这时他又养成爱作哲学思辨的习惯，看见江滨的水淹没了石头，就思考石头不见了是否还存在？读《孟子》、《荀子》，就探讨人性问题，认为人性应兼有善恶。其父信性善论，就和其父“断断争辩”。

1926年，唐君毅17岁，到北京上大学，先读中俄大学，后又考入北京大学。在北大，他听过梁启超、胡适之、梁漱溟等人的讲演。他反对胡适之推重西方文化的态度，而受梁漱溟的影响至深。他虽然不完全赞同梁先生的文化观点，但对他的品格很敬重，认为他“是一个对学问真诚的人”。当时梁在北大作连续的学术讲演，每次门券银洋一元，唐君毅也去听讲。当时左派学生攻击梁漱溟，他迫于精神上的压力，没有再去听讲，而梁先生则以为他没有钱买门券，托人馈送他银洋五元。这使他

① 《记重庆联中几个少年朋友》。

深为感动,“深感前辈爱护后进之风范,为不可及”<sup>①</sup>。

1927年,唐君毅由北大转到南京中央大学哲学系,受学于方东美、汤用彤。当时北大的熊十力应邀在中大作短期讲学。他从方、汤那里学习西方新实在论哲学,从熊十力那里学习新唯识论哲学。又曾自学数学,读爱因斯坦、普朗克、怀特海的著作,由此走上西方唯心论的路子。他对康德的“超越的统觉和理性”很赞赏,对他“道德上的当然在经验实然之上”的观点亦很赞同。对费希特、黑格尔的“纯粹自我”和“纯思中的理性”也很欣赏。<sup>②</sup>同时对宋明儒者的著作也很重视。当时他思考的哲学问题,主要是心物问题。对于唯心论者认为身体束缚心灵,心灵则要求超拔和还原自己的观点,他认为是“颠扑不破”的。这以后成为他形上哲学的重要部分。

1932年,唐君毅于中央大学毕业,获文学士学位。旋即返回四川成都教中学。一年后又回到中央大学任助教。1936年被提升为讲师。次年转任华西大学讲师。抗战开始,他在重庆教育部任编审,与周辅成、程兆熊、牟宗三等人创办《理想与文化》杂志。1940年返回中央大学任副教授。四年后升正教授。1947年秋,因为哲学系的矛盾,他离开中央大学到无锡江南大学任教授兼教务长。1949年春,应广州华侨大学聘请,与钱穆赴广州任教。此时大陆解放在即,唐君毅便在8月和钱穆移居香港。

---

① 《唐君毅先生纪念集》第125页。

② 《生命存在与心灵境界·后序》第467页。

唐君毅在大陆执教期间,虽然对中西哲学的异同作比较研究,曾有《中西哲学思想比较论文集》问世,但这一时期学问重点则在人生和道德问题。1944年由中华书局出版的《人生之体验》,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道德自我之建立》,以及大部分写于这一时期、后在香港出版的《心物与人生》、《文化意识与道德理性》等著作,就是这一时期学问的集结。

他到香港后,抱着一种人文主义的教育理想,以继承、发扬及创造中国文化为己任,与钱穆、张丕介等创办了新亚书院。钱穆任校长,唐君毅任教务长、哲学系主任,并一度兼任数学系主任。在新亚初创时期,条件相当艰苦,仅在九龙桂林街租赁二间陈旧楼房作校舍,学生也很少。到50年代中期,新亚得到“美国福特基金会”和“中国雅丽协会”的捐助和合作,在农圃道建校舍,才初具规模。唐君毅在新亚除担任主要课程外,又举办“文化讲座”,不但自己亲自主讲,还邀集当时学术界的名流来讲。从1950年冬天开始,到1955年,新亚的文化讲座共进行了139次。

1963年,香港当局把新亚、崇基、联合三个私立学院合并为香港中文大学。唐君毅被聘为哲学系讲座教授,兼任哲学系系务会主席,并被选为中大第一任文学学院院长。中大成立之初,在体制上实行联邦制,各学院有相对的独立性。1973年,中大的联邦制被废弃,改为一元化的集权制,在教育体制上一仿香港大学。这就使抱着人文主义教育理想的新亚书院陷入了另一困境。唐君毅认为,中大如跟随香港大学,成为港大第二,则中大应与港大合并,没有独立存在的必要。如果中大为

华人社会的需要而成立,就不应一切仿效港大。他力争新亚书院的相对独立性,终因势孤力单而失败。1974年,他以哲学讲座教授的身份从中大退休。这时新亚研究所也为中大所裁撤。

从中大退休以后,他又和牟宗三、徐复观等人在新亚书院原址重建新亚研究所,唐君毅继续任所长。又创新亚中学,致力于基础教育。1975年初,他应台湾大学的聘请,任台大哲学系客座教授。

唐君毅在到港后的最初十年间,由于受中西文化冲突的刺激,学问的重心转移到文化问题上。通过对传统文化的反省和对西方文化的考察,他企图解决中国传统文化的“开新”问题。1953年出版的《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1955年由新亚研究所印行的《人文精神之重建》,1958年出版的《中国人文精神之发展》,以及许多篇章写于这一时期,而在1975年出版的《中华人文与当今世界》,就是这一时期研究成果的集结。1957年,唐君毅应美国国务院的邀请,出访美国。在与国外学人的接触中,他深感西方学人大多误解中国文化。经与牟宗三、徐复观、张君勱联系,由他起草,而由四位先生署名的《中国文化与世界》的文化宣言,于1958年元旦在《民主评论》及《再生》杂志上同时发表。在这一宣言中,他站在维护中国文化的立场上,充分肯定中国文化的价值,并对西方人士研究中国文化的态度进行条分缕析,指出他们的错误,在国际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唐君毅在居港的后二十年中,学问的重心转移到哲学史和哲学上。1966年出版了《中国哲学原论·导论篇》,1968年

出版了《中国哲学原论·原性篇》，1973年出版了《中国哲学原论·原道篇》三卷，就是这一时期研究中国哲学的成果集结。而由他在医院作最后一校，1977年由台湾学生书局出版的《生命存在与心灵境界》上下册，则是他一生学问思想的总结和哲学思想体系的最后完成。

此外，唐君毅在居港期间，还有《哲学概论》、《青年与学问》、《人生之体验续编》等著作问世。

他积劳成疾，身患数病。1966年以左眼视网膜剥离曾到美国、日本、菲律宾等地手术治疗。1976年8月，右肺患肺癌，9月在台湾荣总医院手术治疗。从此体质大为下降。1978年2月2日，终因肺癌扩散，病情恶化，加之并发哮喘病，不幸于香港浸会医院逝世，享年69岁。

唐君毅是一个学贯中西，知识渊博，造诣很深的学者。一生怀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儒者抱负，自尊自守，不以个人的利害得失为念，致力于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直至动了肺癌大手术，身体衰耗，犹说“活一天，便须尽一天的自己责任”。著述授课未尝一日间断。

唐君毅一生评判是非、功过的标准，个人的忧喜哀乐，都与中国传统文化联系在一起。对于“过去上海这个大都市”的“奢侈、腐烂”风气，“共产党来，亦变为朴实”，他作了肯定；对于文革中不少历史文物遭毁与批孔孟之道，他表示忧愤。在他去世的前一日，听说大陆有人著文为孔子恢复名誉，感到十分欣慰，并要把自己的著作寄送大陆的三个图书馆。

但是，由于他错误地把马列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对立起

来,把中国共产党坚持以马列主义为指导改造中国,视为否定和废弃中国传统文化,由此产生了一些政治偏见。他大半生栖身于殖民地的香港,抗尘抵俗,未免处处碰钉子,“受尽洋气”。他和钱穆所苦心经营的新亚书院,也终于为港府兼并,因而常常感到孤寂和苍凉。唐君毅的一生,可以说是维护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生,儒者的一生,带有悲剧性的一生。

## 二

唐君毅早年的学思,集中在人生和道德问题上。以后治学虽别有所重,但他对人生问题,却一直未曾忽略,在居港以后,还有《人生之体验续编》问世。

唐君毅认为,人生的根本在心,或者说,在精神。原因是,从外面看,人虽是现实的物质存在,是14种原质的复合物。但是,从内里看,则人是精神的存在。精神与身体比起来,更能代表人的“自我”。因此,心是身的主宰,而身则只是心的外壳。“以心统身,理乃自真”。<sup>①</sup> 人的根本,是心而不是身。

由此,他把人生的一切活动都看成是心的活动,精神的活动。他把人生的活动从低到高,分为求个体的生存,求爱情,求名求位,求真求美求善等几种类型。认为这些活动都是心的活动的不同形式。在这里,求个体的生存,不过是继续现在的我,呼唤未来的我,这在本质上,只是心的一种活动。男女相爱,这

---

<sup>①</sup> 《道德自我之建立》第176页。

是对对方形色的慕悦，而形色的慕悦，乃是彼我之心的表现。而由爱情而来的结合，就是心的结合。求名求位，无非是将自我投映于他人之心，使自我价值得到他人之心的承认，这在本质上也是心的活动。追求真善美也是如此。知识上求真，是心智的运用；艺术上求美，是具象会心，提升人的性灵；道德上求善，是拓展爱心，由亲亲而仁民，由仁民而爱物。唐君毅认为，心灵精神的表现有充盈和不充盈的区别，人生的价值也就有高与低的区分。心灵精神获得最大限度的表现，人生就高尚；心灵精神闭塞，人生则入陷阱。

由此，他对现实人生的体验是有矛盾的。他认为人生有正面亦有负面；有正道，亦有魔道；有正位，亦有颠倒；有真实，亦有虚妄。正的方面，是指人生的美好、积极和有价值；负的方面，是指人生的艰难、曲折、丑恶和虚幻。

因为感到人生美好和有价值，所以，他认为人生虽然有限，但人不当有自我渺小之感，其实也并不渺小。宇宙虽然无穷无尽，但人心却能与宇宙同样的无穷无尽。人身尽管只是七尺之躯，然而人的精神却能和宇宙周流往来。同时，人虽有死，人生却不当有飘忽之感，其实人生也并不飘忽。人生不过百年，和无穷的时间比起来，只是短暂的一瞬，但人生在世，却是唯一无二的。也正因为唯一无二，所以人生才有无上的价值。

因此，人生目的，不在追求快乐，不在满足欲望，也不在求生命的更广大丰富，而应该在实现自我。唐先生认为，人生的最大幸福，乃是纯粹的精神活动的幸福。人要时时以反刍的精神，细细咀嚼生活的意义，去求取人生的智慧，使自己的心灵，